

英国研究中心

《英国观察》报告总第14期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名家专访：钱乘旦教授

2023年8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有幸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进行了专访，围绕研究经历、世界史学科建设等话题聆听钱乘旦教授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对专访内容进行系统回顾。

胡雨蒙：钱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位世界史博士，您长期研究世界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首先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世界史，尤其是在英国史领域进行学习和深造，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习经历。

钱乘旦教授：这个题目之前有很多人问过，大家都非常好奇为什么我会选择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英国史。而且由于在当时，英国及其历史是很少受到学界关注的，所以有的人还很好奇，为什么不去研究美国或者其他更热门的历史。

我走上世界史研究这条路，是从我考上硕士研究生开始的。在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我有报考研究生的资格，在选择报考方向的时候，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了外国历史这样一个方向，因为报考条件要求考生必须掌握一定的世界史知识和外语，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方向挺合适自己。因为那时我十分喜欢读书，但囿于条件艰苦，只能是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其中就包括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初次接触世界史就是在马列的著作中，其中包含很多的外国历史事件以及人物，那时候对这些历史事件存在很多的困惑，觉得自己都不太了解，所以我就开始看一些与历史相关的书籍，这才慢慢地对外国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外语方面，我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看到世界史专业，我觉得自己挺喜欢的，而且感觉也比较适合，所以我就选择报考了世界历史，并作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研究世界史的学术生涯。

关于为何学习英国史，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在今天听起来会比较有趣。我学习英国史完全是学校分配的。当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外国史方向包括我在内仅录取了三位硕士研究生，而这个方向恰好有三位导师，于是就按照一个导师和一个学生来进行分配，而我就被分配到英国史方向，也因此走上了研究英国史的道路。

胡雨蒙：钱老师，您长期深耕世界史并且颇有建树，为中国的
世界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那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程呢？

钱乘旦教授：中国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其实起步是很晚的，之前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非常狭窄。中国历史学的传统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若从孔子算起的话，到现在至少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却始终欠缺对外国的了解。古代的中国人只有“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天下观，而没有形成客观正确的世界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根本分不清外部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而是笼统地将所有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都统称为“弗朗基人”。后来，在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了解中国以外主要有哪些国家，以及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伴随着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众知识分子提出“睁眼看世界”，中国才开始初步产生了“世界”的概念。

从 19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末期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情况的认识经历了从“一无所知”到“初步了解”的转变。中国真正开始系统性地学习和研究外国历史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彼时的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部分学习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像北洋舰队的将官们大部分都选择学习机械、土木工程、军事学等专业，这主要是受到了洋务运动的影响，仅有少数留学生学习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文科专业。而那些前赴国外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就接受了其所在国家的培养模式并开始学习该国的历史。但当时尚未出现“世界史”这一概念，而是被称作西洋史和东洋史，这就是最早的世界史。“西洋”即欧美的几个强

国，“东洋”基本指的就是日本。大部分在外学习历史的学生回国后，便开始进入高校教书，但这些人普遍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当时国内社会只将世界史视作知识而非学问，当时国内的历史学主要指的还是中国史，教师们可以向学生传授外国史学知识，但外国史却无法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得到深入研究。同时，单纯做外国历史研究而不涉及中国史研究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学界的认可，既研究外国史，又兼顾研究中国史是当时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现象，所以国内老一辈做外国史研究的专家大都培养出了学贯中西的本领。

世界史在中国真正被接受成为一门正式的学术学科，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至今尚不足一百年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体系，而当时苏联有专门的世界史学科，我们当然也要学过来，也正因如此，世界史终于被列为历史学类下设的一级学科，开始得到国内社会的承认。50 年代以后，我国高校的历史系也开始逐步完善学科建设，出现了独立的世界史教研室，这里的老师都是专门的世界史教师，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同时教授而且研究外国历史的老师。

周帝言：老师，正如您刚才所说，中国对外国历史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中国世界史的学科化发展也是比较晚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世界史观经历了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演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经历了从“学知识”到“做学问”的转变。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教，您曾经提出过，我们要破除西方中心

论，来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理论体系。那么，中国的世界史理论体系与传统的以西方为本位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有哪些区别？我们应该如何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理论体系？

钱乘旦教授：根据我刚才介绍的情况，你们其实应该发现，中国的史学研究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孔子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根基是非常深厚、从未中断的。但相比之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根”并不来源于中国的史学传统，而是从外国“拿”进来的。最早到国外留学的中国人学的是外国历史，接受的教育是外国史学传统下的教育，研究方法也几乎完全照搬外国。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根”和中国的中国史学科的“根”是不同的，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历史不就是历史嘛，其实此历史非彼历史，它们的“根”是不同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以及方法等都是不同的。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开始学习西方，后来又学习苏联，所以中国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史学，二是苏联史学，而不是中国史学，这样一看，你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从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开始，西方逐渐强大，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几乎全部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控制。除西方列强外，其他国家要么沦为殖民地，要么沦为半殖民地。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在那个时候的自我膨胀就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解

释也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中国一开始就学的是这套东西，所以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还经常看得到类似于“西方是最正确的”这种情绪。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到现在，确确实实是需要去构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能够准确地表现全人类客观的历史变化过程。同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还应能够更加完整和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和理论，这也是我们现在亟需去做的一件事情。

当前，我国的历史教材也深受西方的影响，内容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历史为主。很多中学历史教材里，在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时，还会提到尼罗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等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但从中世纪开始，教材中基本上讲的都是西方的历史。譬如，讲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是在讲西方的封建社会，但书中却未曾描述东方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样，比如伊朗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样，土耳其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样。同时，大量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其实并未加以说明，比如，非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亚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以西方为主体写出来的历史是不准确的、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加以改正，以更加完整、更加准确地呈现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世界史是不包括中国历史的，这一点也比较反常。譬如，我们的学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不是来源于世界史教科书，而是中国史教科书。

李英豪：老师，我们知道您是研究英国历史方面的专家，所以最后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有关于英国历史的问题。众所周知，英国的崛起发轫于“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是因为采取了不流血的手段，而这远不同于激进的法国大革命。那么同为欧洲强国，英国的革命为什么会以如此和平的方式进行呢？

钱乘旦教授：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它不仅仅是过去中国人狭义所理解的天下。当时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够在西方几个强国的历史中找到他们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的原因。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去了解英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他们在了解英国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英国的政治制度跟中国是不同的；而在了解法国历史的过程中，就发现法国有大革命，而大革命推翻了反动政权、专制主义，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受到法国大革命的诸多启发。当然，英国也有过多次革命，譬如，著名的光荣革命。在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迅速崛起，并通过接下来的工业革命，达到实力的巅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很早地把关注点放在了英国革命上。

至于为什么英国走上那样一条道路，而法国又走了另外一条道路，我个人的理解是与以下两个因素直接相关。第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差异，这种历史过程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后来发展路径方面的区别，过去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后来发生的事。换言之，就是历史的不同导致了发展道路的不同。第二个因素可能跟

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性有关，而国民性的形成又与历史直接联系。国民性是在一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国家的国民性的特点是有区别的。总之，这两个因素导致英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是自身的历史过程不同，二是由过程的不同所导致的国民性的不同。

（撰写：英国研究中心课题组：科研助理周帝言、胡雨蒙、崔莹佳、李英豪；专任研究员孙志强。）

英国观察报告

主编：张蕴岭 副主编：李远 执行副主编：孙志强

主办：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系人：边宁 电话：0631-5685565

报送：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威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及各相关部门